

推拉理论视角下川西高原牧区人口流动的行动逻辑

王荣玉 杨思晨 赖家其 吴琦琳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610000；

摘要：民族地区人口的动态化过程是民族同胞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有力体现，也是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表征。文章基于推拉理论，探讨川西高原牧区人口流动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若尔盖地区牧民流动受原居住地推力与阻力、迁入地拉力与阻力共同影响。原居住地推力是关键因素，经济利益驱动是主要动力，地缘认同和社会网络构成原居住地阻力，迁入地的经济回报与文化活动提升其吸引力，流动成本与社会融入困境形成迁入地约束，公共资本兼具推、拉双重作用。最后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推拉理论；牧民；人口流动；民族地区

DOI：10.69979/3029-2700.25.10.078

引言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动构建新型城镇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城镇化发展已经由第一阶段过渡至第二阶段，城市化阶段的新转变不仅重塑着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同时还对人口流动方向和规模产生显著影响，流动人口成为城市化发展中扮演愈发关键的驱动角色。现阶段，从乡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依然是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模式。在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中，来自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占据相当比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长期受到自然地理条件、公共基础设施与产业结构等多重因素制约，基于此背景，人口迁移流动成为民族地区群众追求自身发展、改善生活质量的选择。民族地区人口的动态化过程，不仅有力的体现了少数民族人口共享城市发展改革成果积极态势，更是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体现。

1 文献综述

推拉理论缘起于西方学者对人口迁移的研究，是解释中观层次的人口流动的经典模式和分析框架。在英国学者莱文斯坦提出著名的迁移七大定律基础之上^[1]。直至60年代，埃弗雷特·李提出系统的推拉理论，指出迁移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原居住地因素、迁入地因素、中间障碍性因素和个人因素^[2]。此后，推拉理论传入中国后，学者在应用基础之上进行本土化调适和创新，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分析中国农民工流动因素、城乡人口流动与引入户籍制度等。

流动人口规模大，空间分布不平衡是当前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特征。基于人口发展趋势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考量，我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迁移过程。从流动格局来看，我国人口流动呈现非均

衡双向流动格局，人口流入和流出规模、速度以及方向在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人口流动逐步从跨省流动为主导转向省内流动为主导^[3]。人口空间分布和经济空间分布不均匀，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具有空间一致性且具有相互作用关系，这种人口与经济在空间中的耦合，深刻影响区域发展的格局和城镇化进程。

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是归纳人口流动动机的主要依据。经济与就业是人口流动的核心驱动指标，流动者个体所能切身感受到的社会经济回报在流入地选择机制中起重要作用^[4]，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有近半数因经济性原因流动^[5]。此外，人口流动的驱动模式也发生一定改变，由经济因素单一驱动向受社会和自然环境因素共同驱动转变。西部各省份经济社会因素对省际人口净流入的影响相对较小，舒适度水平逐渐成为人口流动的重要驱动因子^[6]，地区公共服务、环境质量、社会网络等非经济因素越来越得到重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原因兼具宏观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和微观谋求经济收入、文化和心理等因素^[7]，民族地区人口流动是推动民族间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途径。

2 川西高原牧区人口流动的行动逻辑

2.1 原居住地推力：畜牧业困境与草地资源变迁

牧民的畜牧资产与草地资源是牧民经济资本的重要构成，畜牧业收入的减少与损失直接关乎牧民参与畜牧活动的持续性，进而成为影响牧民流动意愿的关键因素。川西高原地区作为传统牧民聚居地，其生产模式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进行的畜牧活动，牧民的收入同时受到牲畜市场价格波动与自然风险影响。一方面，地处市场边缘的草原牧民，获取市场信息的能力有限，在市场行为中往往处于被动位置。另一方面，牲畜的死亡风险

也同样影响着牧民的收入，在与牧民的访谈中，部分牧户一年中牦牛死亡数量最多可达 80 头，绵羊死亡数量最多可达 200 头以上，其中因病死亡的数量占两者总数的三分之二，另有部分受野生动物攻击和自然灾害致死。由此可见，牧业生产具有脆弱性和风险性。

草地资源是草地畜牧业的核心生产资料，也是牧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下，草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逐渐下降。一方面，高原牧区季节草场资源不平衡，气候变化带来的气温变暖与极端气温的出现，加剧了草场环境的恶化与草地生产力下降。另一方面，传统的发展观念着重强调草场的生产功能，为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益，过度放牧导致草场生态功能受损，牧民生计提高缓慢。此外，草场流转作为一种借助市场机制实现草场资源有效配置的方式，对牧民的经济活动和流动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对于草场转出者而言，在增加经济收入的同时，还能够促使其自身从草场管理中解放出来，将个体时间劳动投入到其他经济活动中去，这样的模式更加能促使牧民流动并且实现劳动性质的改变。

2.2 原居住地阻力：地缘认同束缚与社会资本约束

乡土观念是地缘认同的典型表现，构成原居住地阻力的重要文化根源。费孝通所提出的“乡土中国”概念，精准契合传统中国社会的本质，在传统的生产生活模式之下，无论是耕种土地的农民还是放牧为生的牧民，都同土地建立起紧密深厚的情感联结。对于牧民而言，生长牧草的这片土地被牧民视为命根子，他们大多保持着敬畏土地、热爱生灵的惯习。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安土重迁的“乡土中国”向高迁移率的“迁徙中国”的重大转型，人口的规模性流动对原有的乡土社会具有不同程度的形塑作用，同时主体的乡土情结也对流动与否产生抵抗力，这种依恋使民族地区外出人口不愿意放弃土地的使用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造成牧民的宁愿贫穷也不离乡的心理。

社会资本是个体在社会结构中所拥有的社会网络联系，并像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可以获得回报。在牧民群体中，社会资本充当牧户之间沟通交流的重要纽带，深刻着影响牧民的经济行为。而且，牧民的本地社会资本越丰富，其个体流动意愿越低。一方面，社会资本以信任规范的形式，保障牧民的经济活动得以具备稳定性，面对突发自然灾害时，牧民之间共同应对风险增强生计韧性。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能够弥补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缺陷，通过熟人关系降低信息差以及交易成本。具体来看，与牧民紧密相关的三种主要网络资本分别为以牧民为核心的家庭亲属网络、以牧民居住地为核心的村

里人或村集体，最后是寺庙。牧民一旦选择离开在地化的社会资本场域，原有的社会网络的功能就会被弱化，基于理性和风险应对的考虑，不少牧民对流动持有保守态度。

2.3 迁入地拉力：经济收益吸引与文化生活驱动

人口流动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追去经济利益是促使个体执行这一行为的主要动机。从区域经济发展来看，与原居住地相比，迁入地一般具备更高的经济水平，城市经济总量与经济增长速度体现出明显的经济活力，对流动人口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同时，流入地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对不同群体素质要求具有较高宽容度，尤其是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发展，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流动人口也能找到与之匹配的工作。此外，除了即时的经济获得，职业晋升空间、工作岗位与个人兴趣的契合程度也成为部分流动人口选择流动与否需要考量的因素，尤其在流动青年群体中表现明显。

文化娱乐活动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迁入地多样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氛围也是吸引牧民流动的重要因素。同乡聚集流动是牧民流动的特征，同等条件下，牧民更倾向与选择有熟人前往的目的地，一定程度上能够延续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同时还能保持相对稳定的文化氛围。例如，在成都市武侯区现存几个民族聚居社区，藏族居民会围在一起跳民族舞蹈。在原有文化得以保留的基础上，迁入地新的文化活动和生活方式为流动人口带来新的体验，居住在牧区的居民，其文化娱乐活动主要以当地民俗文化为主，而城市提供不同以往的文化娱乐形式，如文艺表演、艺术展览以及影视活动等，这种文化体验上的差异，也成为牧民选择流动的拉力。

2.4 迁入地阻力：生存成本压力与社会融入障碍

根据理性选择命题，人们对于两种行动进行取舍时，会基于自身的认识，选择获利可能性增大且结果总价值更高的行为，对于流动人口而言，在前往迁入地过程中，流动人口前往迁入地面临就业成本、生存成本、交通成本和风险成本等^[8]。牧民选择流动后，一方面原居住地的经济行为会受限，另一方面又面临新的生活支出，进而增加生存成本。此外，交通成本与人口流动半径密切相关，并对流动主体的往来频率产生影响，尤其对于异地务工群体表现更加明显，在节日习俗或农忙时期，不少流动人口会回到原居住地与家人团圆或共同劳动，交通成本的提高也限制着流动行为。

社会融入作为与社会排斥相对应的概念，能够反映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社会融入涉

及主体与客体的相互调适。对于流动人口而言，部分民族地区流动人口仍然面临社会融入困境。脱离原有社会网络与文化背景，以“外来者”的身份进入新的场域，一般通过业缘重建社会资本。一方面，个体归属感和心理认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迁入地的包容度与接纳程度，另一方面，社会政策层面的排斥与社会交往中的偏见等因素都会对流动人口的流动意愿形成阻力。

2.5 公共资本的双重效应：推力与拉力的交织

公共资本是指由政府或社会提供的、服务于区域全体成员的共偶功能服务与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性资源，在人口动态过程中呈现双重属性。首先，交通网络的便捷程度直接影响人口流动的意愿与能力。原居住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性构成显著推力，与部分流动人口迁入城市相比，牧区交通网络密度低。反之，迁入地大城市高效的交通网络成为核心拉力，使流动牧民既能降低流动成本多段空间距离，又能兼顾牧区事务与城市就业。其次，教育基础设施是驱动牧民流动的重要非经济因素。对于牧民而言，寻求优质的代际教育资源也是牧民流动的重要追求，期望通过良好的资源使子女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最后，医疗水平的差异通过生存质量与风险应对能力影响流动决策。原居住地医疗资源匮乏构成推力，牧区的医疗水平受限于当地经济水平与人口容量，此外，迁入地先进的医疗设施与社会保障构成拉力，降低了牧民的健康风险，体现了公共资本生存保障型拉力的作用。

3 研究总结

流动性是现代性的表现形式，人口流动是流动社会的重要内容。民族地区人口流动是民族间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提，也是协调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的主要途径。为应对民族地区人口流动问题提出以下措施：

第一，坚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流动人口在追求基本的经济要素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考虑教育、医疗、交通等非经济因素，基础服务均等化的实施不仅能够缓解区域间发展差异，同时还能够促使不同地域居民共享发展成果。

第二，坚持城乡一体化，鼓励发展乡镇企业。乡—城之间的人口流动依然是现阶段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方向，发展乡镇企业不仅能够缩小城乡之间发展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同时能够吸纳本地劳动力就业，使流动人口不出县城就可实现近距离就业，能够兼顾家庭和经济收入。

第三，完善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流动人口是弥合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差异的有效手段和力量，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进一步优化人口资源的空间配置，最大限度的发挥人口资源优势，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使流动人口更好的融入城市。

参考文献

- [1] Ravenstein, Ernest George. "The laws of migr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52.2 (1889): 241-305.
- [2] Lee, Everett S.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3 (1966): 47-57.
- [3] 王洁晶, 张沐华, 王霓霓. 中国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基于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研究 [J]. 人口学刊, 2023, 45(04): 82-96.
- [4] 周皓, 刘文博. 流动人口的流入地选择机制 [J]. 人口研究, 2022, 46(01): 37-53.
- [5] 段成荣, 迟松剑. 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状况研究 [J]. 人口学刊, 2011, (03): 21-28.
- [6] 张伟丽, 郝智娟, 王伊斌, 等. 城市群人口流动空间网络及影响因素 [J]. 地理科学, 2023, 43(01): 72-81.
- [7] 汤夺先, 郭宁. 缘何外出: 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原因的理论探讨与具体解析 [J]. 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42(01): 8-14.
- [8] 陶斯文. 四川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 138-139.

本项目获“西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为 3300224782，西南民族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

作者简介：王荣玉（1999 年—），男，满族，河北承德。社会学硕士在读，西南民族大学，人口社会学。四川省成都市，610041

杨思晨（2003 年—），女，回族，宁夏灵武。社会学本科在读，西南民族大学，应用社会学。四川省成都市，610041

赖家其（2004 年—），男，汉族，江西赣州。社会工作本科在读，西南民族大学，社区治理。四川省成都市，610041

吴琦琳（1999 年—），女，羌族，四川绵阳。社会工作硕士在读，西南民族大学，城乡社区治理。四川省成都市，610041